汉武帝时代将军制度研究

张艳国

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汉武帝时代军事结构中的一个子系统——军事指挥系统，亦即军队的将领组织管理制度。至于与这种军事制度相关的系统：军队的兵种构成、士兵征调系统、士卒组织系统等等，由于笔者已试作探讨^①，故不在此涉及。

西汉，特别是汉武帝时代，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军事现象，就是领兵征战的主要将领拥有称号——将军。如卫青领号大将军，霍去病领号骠骑将军，李广领号前将军，郭昌领号拔胡将军，李广利领号贰师将军，等等。除大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卫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、前将军、后将军等等称号源于前代外，发生于汉武帝时代的将军称号尚有12种之多^②。如果将它们简略分类，可以分为：军阵将军称号、军制将军称号和方术将军称号。前两类用于军事活动，后一类则因军事而在社会生活中衍生^③。这是封建皇帝对封建国家众多的军事指挥官进行有效控制、能动管理的一种关系形态，不同的将军称号的背后反映着它们的隶属关系，代表着他们在军事、政治生活中的特权、作用和地位。因此，它是一种反映军事生活、政治关系的制度，值得认真探讨。

一、将军制度的组织状况：将军的辖属关系

在汉武帝时代的将军制度中，分别由大将军与骠骑将军执掌两个不同的军事组织系统。前者操作武官系统，后者管理武散系统。

杜佑《通典》卷十九《职官一·武官下》“大将军并官属”条有“车骑将军、卫将军、……左、右、前、后将军……杂号将军”等，不载骠骑将军，而骠骑将军见载于《职官一》第十六“武散官”类。又郑樵《通志》卷五十五《武官》第八下“大将军并官属”条有“车骑将军、卫将军、左、右、前、后将军……杂号将军”等，无载骠骑将军。而骠骑将军列入卷五十五《官职》七《武散》第十二之“武散官”类。马氏《文献通考》亦如是。作者分别把大将军及其官属与骠骑将军列入武官类与武散类。

既然在将军制度中有武官系统与武散系统之分别，那么，这两大系统的军事首脑大将军与骠骑将军的关系如何呢？这是应该首先搞清楚的。

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官职、地位相等^④。

汉武帝废太尉而置大司马：“太尉，秦官，金印紫绶，掌武事。……元狩四年（前119）初置大司马，以冠将军之号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冠者，加于其上为一官也。”据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知事情的原委是：元狩四年，汉武帝“乃益置大司马位，大将军、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。定令，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。”《集解》引如淳曰：“大将军、骠骑将军皆有大司马之号

也。”《索隐》案：“前谓太尉，其官又省，令武帝始置此位（按，大司马），卫将军、霍骠骑皆加此官。”以大司马代太尉之称，可知大司马系最高军事长官之职；又，两人同为一职，且无秩禄差异，是无正副职之分。须知，中国古代之官制通则，正副职秩禄有差。足见两将军官职、地位相等，都是军队的最高军事领袖。如果怀疑《史记》的准确性的话，还有例可佐：

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传》云：“大将军，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。”晋灼曰：“悉加大司马者，欲令骠骑将军与大将军等耳。”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将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并置一栏：“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。”“骠骑将军同大将军品秩，位亚丞相。”^⑤

准上，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官职、地位相等，这样，在军事指挥系统上是不是显得混乱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前叙，他们分别操作不同的军事指挥系统，如此反而显得系统功能的健全。进而我们可以弄清武官系统与武散系统之间的关系了。其实，上述已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条件。因为分执两个不同系统的军事长官的官职、地位相等，已判然可见这两大军事系统具有并级性，即互不隶属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系统之间正反馈（配合协作）和负反馈（牵制制衡）的关系。两大系统共同受到整个系统——社会结构的总调节者——汉武帝的指挥、控制。史载：

“元狩四年春，上令大将军青、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，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，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”；“捕虏言单于东，乃更令骠骑出代郡，令大将军出定襄”；“郎中令为前将军，太仆为左将军，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，平阳侯襄为后将军，皆属大将军”；“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，车重与大将军等，而无裨将”^⑥。

以上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：1. 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各有一支等量的军队，竟连车重也相等；2. 各自接受汉武帝的指挥，虽然总的军事目标一致，但在军事行动中互不受对方调节，在具体的军事目标中，两支军队各由自己的军事统帅决策、施令；3. 各自有一套完备的军事控制系统，对执行汉武帝的军事指令的反馈不一致；4. 两大军事系统的总调节者汉武帝也受到战争信息的反馈调节，改变军事指令，发挥系统的最佳功能。这是一个复杂的双向循环的大系统。

那么，构成这个大军事系统的两个子系统的结构是怎样的呢？下面，先解析武官系统的辖属关系。

大将军统辖六军：卫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、前将军、后将军。但是，并不是每次征战中，大将军均须统领此六将军出征，“或有左、右”，“或有前、后”^⑦，或前、后、左、右并属出征（如前引），或有车骑，或有卫将军，其制则一^⑧。

车骑将军、卫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、前将军、后将军品位同一。蔡质《汉仪》曰：“车骑、卫将军、左、右、前、后，皆金[印]紫[绶]，位次上卿。典京师兵卫，四夷屯警。”《通典·职官十》言：“车骑将军、卫将军、左、右、前、后将军，皆金印紫绶，位次上卿，掌京师兵。”《通志·武职五》所谓，与杜佑同，故不重复。

汉武帝时代，杂号将军很多，据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十三》载，计有骑将军、骠骑将军、楼船将军、横海将军、材官将军、贰师将军、轻车将军、伏波将军、中军将军、强弩将军、戈船将军、奋威将军等等。均因战伐而设，战罢即废，故不常设。郑樵说：“权时之制，若此非一，亦不常设。”^⑨杜佑引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说：“杂号将军，皆主征伐事，讫皆罢。”^⑩在征战中，一般说来，杂号将军受辖于车骑将军、或卫将军、或前将军、或后将军、或左将军、或右将军。史载：

“令青将三万骑出高阙，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，代

相李蔡为轻车将军，皆领属车骑将军，俱出朔方。”^{①①}

余例不一赘引。当然，有个别特例是领杂号将军称号者直辖于大将军征战，则不在军制讨论的范围之列了^②。还要指出的是，在军制上，卫将军是可领属杂号将军的，但是，实际上卫将军偶尔出征时，一般不领杂号将军，其属有定员。列表如下：

卫将军镇南北军表^③

北 军	中垒校尉	掌北军垒门内，外掌西域。	南 军	朔门（仆射、虎贲郎、中郎将）	掌执兵送从
	屯骑校尉	掌骑士。			
	步兵校尉	掌上林、苑门屯兵。			
	越骑校尉	掌越骑。			
	屯水校尉	掌屯水宣曲胡骑。		羽林（中郎将、骑都尉、城门校尉）	掌送从、掌京师城门屯兵
	胡骑校尉	掌池阳胡骑。			
	射声校尉	掌诏待射声士。			
	虎贲校尉	掌轻车。			

卫将军所领之兵，拱卫京几，任务重大，所以管理得十分严格。统属定员，即便征战也不变更其制；又，南北军兵士之选择，均受过特别审查，训练亦十分刻苦，非杂号将军所领之兵可比。故卫将军一般遵制而行，不领杂号将军。即在将军之辖属制度上，卫将军征战中领属杂号将军遂成虚制；而且，在战争中卫将军的领属还有变制，下有说明。

但是，如果战争规模不大，列阵出征者皆为杂号将军，则以杂号将军中位次最高者为统领：

“当是时，汉伏兵车骑、材官三十余万，匿马邑旁谷中。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。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诸将皆属。”^④

韩安国在诸将中位次为最——三公之一，另外的位次最高者也不过九卿之一，不及安国。故安国得辖诸军。

杂号将军下辖无号将军（所谓无号将军，即不领将军称号的将军）。杂号将军是汉武帝时代的基本作战单元。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传》云：“最（师古曰：‘最亦凡也。’）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，……为特将者十五人（师古曰：‘特将，谓独别为将而出征也。’），李广、张骞、公孙贺、李蔡、曹襄、韩说、苏建皆自别有传（按，均曾为大将军辖下之杂号将军）。”依此可知，杂号将军李广诸人曾在大将军辖下单独率兵出征，是为基本作战单元。

在杂号将军率部中，又分为各支军。各支军军帅为将军，不领称号，作为基层战斗集体的指挥者。这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有关汉武帝战事记载中以及《资治通鉴·汉纪·汉武纪》中多有记载，不须赘引。试以两例析之：

李息，“至武帝立八岁，为材官将军，军马邑；后六岁，为将军，出代；后三岁，为将军，从大将军军出朔方；皆无功。”^⑤

公孙敖，“后一岁，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，无功。后二岁，以将军出北地，后票骑，失期当斩，贖为庶人。后二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无功。”^⑥

李息第一次为大将军麾下的杂号将军领兵出征，得率一基本作战单元，后因故降职一等，作

了基层战斗集体的军事首领——所以没有将军称号，史书上也只好直书为“将军”，以示区别。对于公孙敖的记载则更为明确，先是以杂号将军随大将军出征，因无功，其后被降为“将军”；然而，不仅无功，反而获咎，因而又降职一级，仅仅作了一个校尉。真是梯级下降。

下面讨论武散系统的内部结构。

前述，卫将军一般不出征，领八校尉屯京几，乃定制；但战争激烈阶段，八校尉被调出征时，其辖属有变，直属骠骑将军。即八校尉的辖属，因战与否，有两制。《通典》卷三十四《职官》十六“武散”条载“骠骑将军之属官”如下：辅国将军（汉武帝时无，汉献帝置）、镇军将军（汉武帝时亦无，曹魏时置）、诸校尉（“〔汉〕武帝初置中垒、屯骑、步兵、越骑、长水、胡骑、射声、虎贲等校尉，为八校尉，各有司马。”）《通志·职官》同此载，《文献通考·职官》亦同此载。因之可知，大抵骠骑将军出征时，领属八校尉，战罢即归还卫将军，仍拱卫京几；偶尔卫将军出征，固领八校尉。

在这里反复申明骠骑将军出征直辖八校尉，言下之意是，骠骑将军不领辖杂号将军及无号将军。按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载，骠骑将军下辖游击将军（属杂号将军类），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的相关材料里均无记载，也得不到考古资料的佐证；反而文献上记载其归属大将军。疑“三通”之说有误。

以武散系统在后世的发展而论，在汉武帝时代，骠骑将军的领属组织还是比较简单的。

二、作为一种政治地位指示器的将军制度：将军与侯爵的关系

汉高祖定天下，与群臣约：“非刘氏不王，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，天下共诛之。”^{①⑦}成为西汉的祖传家法。汉武帝时代，征战屡出，“外曜武威”，“穷兵极武”^{①⑧}，多次颁布奖励军功的诏令。最典型的是元朔六年置武功爵二十级：“一级曰造士，二级曰闲舆卫，三级曰良士，四级曰元戎士，五级曰官首，……”^{①⑨}臣瓚说：“此武帝所制，以宠军功。”^{②⑩}因军功的不同等级，授予大小不同的封邑。故侯爵之封，多以军功。因此，司马迁依据汉武帝时代“北讨强虏，南诛劲越，征伐蛮夷，武功爰列。作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第八。”^{②⑪}在封建社会，有军功就有了政治资本，就会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，这样，在汉武帝时代所突出表现出来的现象是，以军功而侯，成为那个时代军官取得社会政治地位的指示器。因此，很有必要探究将军与侯爵的关联。

第一，为将军者，绝大部分因军功而拥有侯爵，反过来说，汉武帝时代侯者，大部分系将军。

据《史记·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、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下》、《汉书·外戚恩泽侯表》，列表如下：

汉武帝时代侯者统计表^{②②}

侯爵明 细数	侯 爵 数	将军为侯者数	外戚为侯者 数 ^{②③}	子承父侯者 数 ^{②④}	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 而侯者数 ^{②⑤}	其他为侯者数
	89	53	2	2	29	3
百分比 (%)	100%	66%	0.2%	0.2%	33%	0.3%

由上表可见，汉武帝时代因军功为侯者达99%（66% + 33%），封侯者，几乎尽起自行伍。概言之，将军拥侯者，竟占绝大部分。这至少可以说明汉武帝时代军功侯制的繁盛和得到了极大地巩固。当然，也有极个别将军虽有军功，而终未封侯者。如李广“大小七十余战”，而“不得封侯者也”^{②6}。这当然不是军功侯制本身造成的，而是出于当时政治的特殊原因。

第二，将军以下诸军官，均可以军功得侯；而后其出征，司将军职，或有将军称号，或无之（无号将军），为拥侯将军。

霍去病“为票姚校尉，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，斩虏过当。”被封为冠军侯。“去病既侯三岁，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，将万骑出陇西。”^{②7}

赵破奴“以司马再从票骑将军击匈奴，得两王子骑，侯。”后为匈奴将军击楼兰，为浚稽将军击匈奴^{②8}。此二例是以军功为侯后，司将军职，拥将军称号。

张次公“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，封为岸头侯。其后太后崩，为将军，军北军。”^{②9}此是以军功为侯后，司将军职，而无将军称号。

第三，以军事佳才临阵超擢为将军，遇功，封侯；无功，则削其将军职及其将军称号。

李蔡，“事孝文帝、景帝、武帝。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，封为安乐侯。”^{③0}

李息，“至武帝立八岁，为材官将军，军马邑；后六岁，为将军，出代；后三岁，为将军，后从大将军出朔方：皆无功。凡三为将军，其后常为大行。”^{③1}

这些典型记载很说明问题：李蔡，先以将才擢为轻车将军，因军功得侯。而李息虽有将才，但在任将军期间，均无显著的军功，不得为侯；而且，后来甘作文官大行，不习武事了。

第四，在军事行动中失利或因他罪（除谋反、诬上、征战畏死、叛逃等杀无赦罪外），失侯，但并不因此影响其军事乃至政治生涯。即是说，还可以作将军，因功复侯、升迁。

赵破奴，“出北地，封从票侯，坐酎金失侯。后一岁，为匈奴将军，攻胡至匈奴水，无功。后一岁，击虏楼兰王，后为浞野侯。”^{③2}

公孙敖，“武帝立十三岁，为骑将军，出伐，亡卒七千人，当斩，赎为庶人。后五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，封合骑侯。”后又因失军机而丢侯，当斩而赎；后再一次为校尉，再一次为因杆将军^{③3}。

清人赵翼对此评论说：“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录者，如李广利伐大宛，……则以万里征伐，不录其过；甚至失机败事，而罪可谅，其才尚可用者，亦终不刑戮，使得再效，如张骞……皆当斩，皆许赎为庶人，后皆重诏起用，使之立功，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。……其有功特稍骄蹇者，则又挫而用之。……而于畏懦者则诛无赦。”^{③4}总之，这一类的将军与侯爵的关系，反映了汉武帝高明的用人政策与开明的人才思想。

第五，将军以军功得侯，而爵次之高低，获封户之多少，依将军之军功大小而论。用函数关系表示，就是：封户、爵次、级差同将军的军功成正比。

汉武帝时代，因军功获侯爵者，封户又有万户侯、千户侯等次之分。如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均因军功得侯，且为侯爵中最高等次——万户侯。而卫青封户为一万六千三百，霍去病却为一万七千七百，卫青比霍去病要少一千户侯的封户数。因为，霍去病较之卫青军功更盛。霍去病曾因军功四次益封，而卫青仅因军功两次益封。

正因为霍、卫军功至极，所以封户为最，爵次亦为最，而且将军军职也为最。据《汉书·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》、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所载之汉武帝时代诸行伍传，又可见：封侯将军之军职高低大抵也与军功、封户成正比。

综上所述，质言之，将军与侯爵之间的关系，反映了将军与君主之间的关系，而军功侯制，成了联系皇帝与将军的唯一纽带，也是有效地调节皇帝与将军之间关系的唯一手段。它反映出的关系，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政治交换价值，如同韩非揭示的：“臣尽死力以与君市，君垂爵禄以予臣市”^⑤。正因为皇帝握有这种交换价值的主动权——授臣以爵禄，所以才得以高高在上，挥舞着政治使用价值——政治特权的耀目金棒，磁石般地吸引、戏谑着将军们，使之成为他的一批驯服的奴隶而俯首听命。汉武帝在与将军们进行社会政治使用价值的交换过程中，便巧妙地加强了中央军事集权，实施皇权对军权的绝对统治。这样，便使得他的那批“驯服的奴隶们”养成了“最盲目顺从的”“仅存的唯一美德”^⑥。于是，就形成了一个封侯愈多，封赏愈厚，而皇帝专制军事愈益巩固的局面。在政治上，按照军功序列不同的爵级，确定等次不同的经济特权，从而划分不同等级的政治特权，真正体现了“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地产来排列的”^⑦这一封建社会的铁的历史规律。要象霍、卫那样取得最大的政治特权，就必须获得最多的封户，而最根本的是获得最大的军功。丞相以侯，封侯出自军功，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军政官职，列定朝请等次、秩序，确定在军国大是决策中的发言权的分量等等，一句话，通过军功侯制，构建了一个封建的政治等级阶梯；也通过它，把全体社会成员牢牢地固着在这一等级阶梯上。这样，就形成了一个封侯愈多，封赏愈厚，封建等级政治的、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愈益巩固的新秩序。而以军功侯制为枢纽和信息交流、转换的中枢，就构成了一个中央军事集权和中央政治集权而皇帝独裁的、规模空前的庞大胶固体。在封建地主还处在军功地主阶段，这一切都是以将军制度为纽结，通过具有很强的政治灵敏度的指示器将军制度来实现的。

同时，它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：汉武帝时代既是奖励军功、军功爵制的顶峰，又是其尾声，反映了一个历史的过渡性。

汉武帝时代以军功为侯，几乎达到了冗滥的地步；而军功地主获得的实利与政治特权，在西汉历史上又是无与伦比的。元朔五年，大将军卫青征伐有功，其下诸校得侯者7人，又有3人被赐爵为关内侯^⑧。这在西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李广利大宛之战，将军以下侯者多人，且“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，诸侯相、郡守、二千石百余人，千石以下千余人”^⑨，军功地主如此大规模地、堂而皇之地擢得政治、经济特权，这在西汉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。这充分说明汉武帝奖励军功、军功爵制推向了历史的顶峰，同时也预兆着历史的新局面的来临。至武帝晚期，以公孙弘入相而侯，打破了汉世家法——军功侯制。这样，不仅标志着汉武帝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奖励军功之高潮的开始流逝，也标志着西汉历史上出现的久盛不衰的军功爵制被慢慢废弛的开始。自公孙弘以丞相为侯，“其后，以为故事”^⑩，到武帝末岁，“悔征伐之事”^⑪，下轮台之诏，封车千秋为富民侯，“以明休息，思富养民也”^⑫，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，促成了历史的转换，完成了从公孙弘到车千秋的历史过渡。文仕地主以文治而封取代了军功侯制。其后，再也没有“军吏为九卿者”的局面，官府上下，“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”^⑬，它也预示着地主阶级内部政治结构开始新的转换，它呼唤着一个“昭宣中兴”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。从武功转向文治，由军功侯制向文仕封侯的替变，揭示了从武功赫赫的汉武帝到文治漾漾的昭宣二帝的历史性过渡。显然，这并不是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，而是社会结构内部各子系统及其它们之间在调节、反馈作用过程中更换控制机制、改变系统功能的结果。

三、作为一个系统的功能耗散：将军制度的社会作用与影响

恩格斯曾深入研究了古代雅典的军事编制，指出：“军队的编制以莱喀士所定的小队(enomotiae)为基础；两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(pentecostes)，两个中队合成一个大队(lochos)，8个中队即4个大队组成一个联队(moara)。色诺芬时代斯巴达军队的编制就是这样。”^④看来，无论是西方，还是东方，古代的军事家们都强调队与队之间，将与将之间的纵向联系（一种辖属关系）。这种纵向联系，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军事管理制度。如前所述，汉武帝时代“军队中的等级管理制度日益完备，达到了几乎是十足的官僚制度的地步”^⑤。

恩格斯在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一文中指出：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，总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条件，同时对当时的社会以及后世发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。前已提及，汉武帝时代的将军制度是应战而生，那么，它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？

第一，汉武帝建立的一套初具规模的、成系统的、等级制的、管理严密的军事统辖制度，是他开疆拓土、立于不败的重要保证。

列宁指出：“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变，但是，只要国家存在，每个社会就总有一集团进行管理，发号施令，进行统治，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、暴力机构、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握在自己手中。”^⑥汉武帝时代改革战术，加强骑射力量，按照等级原则制定将军称号，加强将与将之间的纵向联系，把社会的整个武装力量分成两个制衡与协作的系统，正体现着这样一种历史的逻辑。

建立庞大的军事管理系统（军事制度），使得辖属严密，号令一致，任务分明，“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！”^⑦正是这套军事管理制度对征战的胜利起到了组织保证，对士卒、军将追逐功利起到了有效的激励作用，这也是汉武帝时代“奋扬威怒，武事四加，所征者服”^⑧的一个不容忽视、十分重要的因素。

第二，汉武帝建立的一整套军事管理制度，实际上加强了他对军事的专制集权，巩固了皇权对军权的统治。

“皇帝是大元老、监察官、执政官、护民官，他把这一切在名义上继续存在的职位，都集中到了自己一个人身上，还有那军事权力——这是最重要的权力（此处重点号为引者所加）——也完全操在他一人手中。”^⑨汉武帝一边建立一套细密的、富有战斗力的军事管理制度，一边把自己塑造成这个军事控制系统的最高主宰，深化了皇权对军权的干预，从而，皇权高高凌架于军权之上，皇权更有力地成为政权和军权的统一体。国家暴力机关成为皇帝的一己之私，成为巩固皇权专制的有力工具。

在建立和操纵这套军事控制系统的过程中，汉武帝又不断变易其将军称号，实际上是把将军从甲军调至乙军，使他们不能在一支部队里长时间地苦心经营，造成尾大不掉之势。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一个最高军事将领大将军卫青竟然不能处置一个犯了军法的部将——将军苏建，要等到押送京师后亲交汉武帝独自处置，以示不敢“自专”^⑩，以表白绝对忠君的心迹。皇权对将军行使军事管理职权的干预，有力扼制了将军个人势力的膨胀，于是便摘除了军事割据、军阀混战的毒瘤。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，当大将军卫青功盛权高之时，汉武帝超擢霍去病，使之立功，建立武散系统，故“去病日以亲贵，比大将军”。到后来，“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”^⑪。汉武帝用心之深可知，一方面，建立制衡的军事制度；另一方面，用新贵去

取代旧贵，转移权力，便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核心。汉武帝时代，一方面通过外戚领兵征战，权高爵重；另一方面，既不断以新代旧，又实施对外戚军事权贵的残酷剿灭政策。在汉武帝后期，用外戚新贵李广利取代了卫青、霍去病这支历史悠久，力量庞大的外戚力量。同时，在鼓励他们征伐力战时，又许以重愿，立其嫡甥为皇储，但一当疆土已拓，而外戚羽翼已成时，便无情刈莫之。先是，以巫蠱事件扫平卫氏支侯者五人以及羽翼，废除皇太子；后以李广利兵败而降事，翦除其积年心腹大员，改变太子人选。因此，汉武帝时代外戚力量虽强，权力虽大，但无所作为，利用兼打击外戚力量的结果，维护了政权的稳固与社会的安定。应该承认，汉武帝时代的将军制度为抑制封建社会的两大毒瘤——军阀割据与外戚干政——的癌细胞滋长与扩散，提供了便利。这时皇权对军权的绝对干预，为维护大一统帝国与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汉武帝在操纵将军系统的过程中，不断调动将军的同时，又不断让其率部出征，使官兵不断地习武事，这样，也不至于因军帅的频繁调动而损害军队的战斗力。这也是汉武帝“材质高妙，……可谓卓尔绝世之主”^②的另一重要表现。可以说，汉武帝时代征伐连年，将强兵勇，调将频繁，而又没有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与北宋兵强将弱的态势，似乎可以从这个时代的将军制度中悟出谜底来。

注释：

- ① 见拙作《论汉武帝时代的军种、兵源及士卒组织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1987年第12期。
- ② 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第59，《职官考》13。
- ③ 见拙作《论汉武帝时代将军制度的缘起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1989年第3期。
- ④ 全日制十年制中学历史教科书1979年版《中国历史》第1册《西汉的强盛·西汉同匈奴的战争》注：“骠骑将军，汉朝军队中的最高军事将领之一，地位仅次于大将军。”此说不确。
- ⑤ 《资治通鉴》卷19，《汉纪》11，胡三省注引《汉旧仪》。
- ⑥⑦⑧ 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
- ⑦ 《文献通考》卷第59，《职官考》13。
- ⑧ 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17—22。
- ⑨ 郑樵：《通志》卷55，《武职》5，《将军总序》。
- ⑩ 杜佑：《通典》卷28，《职官》10。
- ⑪⑫⑬ 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传》
- ⑫ 如元朔六年，卫青率左、右、前、后将军外，尚有杂号将军之中将军公孙敖和强弩将军李沮。
- ⑬ 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
- ⑭ 《汉书·韩安国传》
- ⑮ 《汉书·李息传》
- ⑯ 《汉书·公孙敖传》
- ⑰ 《汉书·外戚恩泽侯表》
- ⑱⑲⑳ 《艺文类聚》卷12，《帝王部二·汉武帝》。
- ㉑⑳㉒ 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
- ㉓ 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
- ㉔ 匈奴及其少数民族降而为侯者，质言之，亦系军功侯之列。
- ㉕ 不包括外戚军功侯者。
- ㉖ 包括石庆。
- ㉗ 不包括少数民族以战功侯者：杜侯复陆支，众侯伊朗、龙侯嫪广德、蔡侯孙都、温清侯参。
- ㉘ 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
- ㉙ 《汉书·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》
- ㉚ 《汉书·张次公传》
- ㉛⑳ 《汉书·李息、赵破奴传》
- ㉜⑳ 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2，《汉武用将》。
- ㉝ 《韩非子·难一篇》
- ㉞ 卢梭：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，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145页。
- ㉟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第169页。
- ㊱⑳ 《资治通鉴》卷19，《汉纪》11。
- ㊲ 《汉书·李广利传》
- ㊳ 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
- ㊴ 《汉书·西域传》
- ㊵ 《汉书·儒林传》
- ㊶⑳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4卷，第12、354页。
- ㊷ 《列宁选集》第4卷，第47页。
- ㊸ 黑格尔：《历史哲学》，三联书店1956年版，第359页。